

快人快语

长城牌系老牌子，是长城铅笔厂的主要产品，乃我国著名化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大煜联手赵忠尧（著名物理学家，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为了不让美国人猜疑，毅然把积攒多年的研究资料付诸一炬，然后义无反顾回国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施汝为（著名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磁学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一起于 1936 年倾力打造的民族品牌。

由于本人在铅笔厂工作过多年，所以对那段历史非常着迷。翻开厂志，一个个铅字幻化成一幅幅前辈们艰苦创业的画面，在我脑海中闪过。但疑惑也不断浮现: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张大煜等在长城铅笔厂开张后，关心过厂里的经营吗？抗战胜利后，张大煜风尘仆仆自昆明赶赴上海，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他抽空去长城铅笔厂指导过管理吗？长城铅笔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以什么形式，资产全部转移到后来的老板郭志明名下的？等等。

通过编辑的启发，我请教厂里的老工人。不料绝大多数老工人（目前已七八十岁）都未亲眼见过吴羹梅和郭志明本人。原来，这两位民族

刻不容缓救“口述”

企业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思想进步，积极靠拢党组织，不但爽快将自己多年打拼的厂子公私合营，且离开铅笔厂分别担任了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如吴羹梅去北京，就任过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并先后在民建总部和全国工商联工作；郭志明则担任了虹口区副区长和区工商联主任等职。

我的目标只能转向他们的后代。经了解，吴羹梅的儿子和女儿，一个定居北京；一个住在济南，但具体住址不详；郭志明有好几个儿子。我委托一个老工人前去试探，结果他劝我不要“无事生非”，也不愿解释理由。

线索断了。走投无路时我突然想起郭志明是崇明人，铅笔厂有不少崇明籍职工，我何不另辟蹊径？于是我找熟悉的郭姓女同事。但了解下来，郭女士祖上虽然也是崇明人，却与郭志明家毫无姻亲关系。不过她父亲（已经离世）倒是郭志明自长城铅笔厂带到中国铅笔一厂的三位中层管理干部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就拿 120 元月薪。另 2 人当中有一位叫郭维民（已经离世）。就因为郭维民是老板的侄子，所以他的月薪为

130 元。我迫不及待问郭女士：郭维民就是厂里管技术的老郭吧？郭女士回答正是。这辰光我真是后悔莫及。原先我在铅笔厂工作期间，就听说老郭肚子里知道很多东西。可那时我正热火朝天忙于搞技术改造，完全没兴趣研究历史。假如我趁老郭活着的时候，虚心好学，老郭必然会原原本本将那些陈年往事像说书似的抖露出来。如今一切都无法挽回。我估计我的几个问题没人能够圆满解答了，将成为一道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尽管兜了一大圈，我依然疑惑，但我却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时光流逝，经历往事知晓老事的老人正在不断离去。而上海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以及重镇，不仅有一些闻名全国的大企业、大老板；更有不少不知名的小企业、小老板，如何及时把那段记录我国民族工业的历史口述笔录保存下来，对文史工作者来讲，应该立刻提到议事日程。正如艺术人文频道著名节目主持人阎华大声呼吁的那样：“别让那些老上海的故事离我们远去；别让那些老人被我们忘记，别让这一切都来不及。”

文 / 徐鸣

父亲母亲

母亲出生在浙江舟山一个贫穷渔民的家庭，从小吃苦耐劳，苦难的生活使她格外坚强。抗战期间，父亲漂泊在海外，母亲靠做帮佣，维持着一个家。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家里子女多，父亲工资低，母亲精打细算，总是起早摸黑，不辞辛劳地呵护关心着我们。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五个子女，经常向母亲喊着肚子饿，母亲每当提着一锅菜粥，总给我们每人盛上满满的一碗，且把干的掏给我们，然后慈祥地看着我们，不时地问我们饱了吗？此时此刻的母亲从未喝过一口稀粥。因为长年辛劳和营养严重不足，母亲得了严重的肝病，此后，身体一直不见转好。

母亲十分重视对我们教育，从不对子女放松教育。记得 1965 年 7 月，我考进位于市西南角桂林路上的师院附中，而我们家住在市东北角的杨浦区的安图路上，那时没有地铁，记得我去学校报到的那天，早上六点钟出门，换乘三辆公交车，到学校已近九点了。那年的 11 月深秋的一个早上，我和同学们在学校操场做早操，忽然班主任老师对我说，

子欲养而亲不待

你母亲来看你了，在校门口等你。我急忙奔过去，只见母亲手里提着一个包裹，慈祥地望着我，她老人家生怕我冷，特地一清早大老远来学校看我。望着两鬓白发、一脸憔悴的母亲，我心疼地责怪她不应送来。母亲将放有御寒衣裤的包裹给我后，叮嘱我注意冷暖，要常回家来，便转身走了，我要送到她车站，她不让，怕我耽误上课。望着逐步远去的母亲的身影，我禁不住落泪了。母亲目不识丁，事后我才知道，那天她早上四点多钟便起床，一路走，一路问，为节约路费，少坐了两辆车步行到校的。

最令我揪心和悔恨终生的是，那是 1996 年的 9 月的一天，记得第二天我要出国考察去，那天傍晚，母亲因感冒在长白医院输液，一连好几天，我因为工作忙，直至临出国前夕，才去医院探望她老人家。母亲见到我，显得十分高兴，连连对我说，感冒没事的，吊吊针就好了，不用担心她。反而问我出国的行李准备好了没？再三叮嘱我在外要注意冷暖，当心身体。吊完针，她要我回去，她自己可以慢慢走回家，当时我不肯，

文 / 王养浩

挽着她的手，慢慢回到了家。一路上，她向问候她的熟人、邻居挥手打招呼，表示感谢。回到家后，母亲喝了一点粥后，便对我说，她没事，再三催我回去，去忙明天出国的事。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我便离开母亲的住处，回到了自己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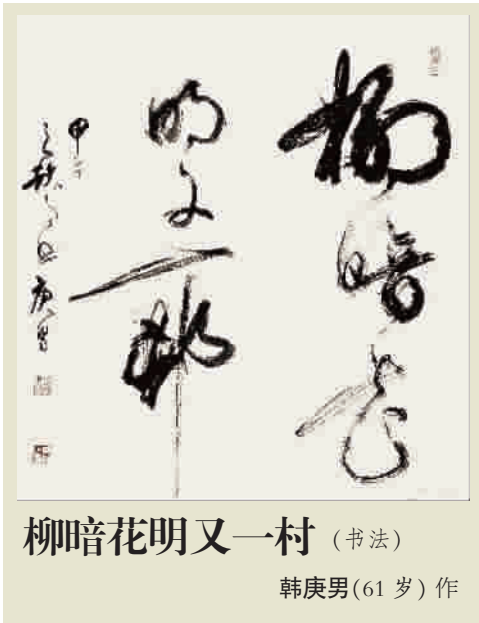
这一夜，我睡得很晚，总有点忐忑不安，关照妻子第二天一定要再去探望下她老人家，有情况要及时送医院。睡下没几个小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我预感不好，谁会在凌晨四点打电话呢？我急忙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了小弟的哭声，告知母亲“走了”。我丢下话筒，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奔向母亲的住处，只见她老人家安祥地睡着，任凭我千呼万嚎，终不醒来再看我一眼。医生诊断，因感冒引发急性心力衰竭去世。如果那些天住院治疗，是可以避免悲剧发生的，留给我们作子女的深深的无法弥补的愧疚。“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何等的一种悲哀！

母恩高于天。每逢母亲节和母亲忌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心里深深地呼喊着。

老人老话(六十三)

文 / 张大成

事的人多事，要惹祸。
漫步新城，可见新城之美；走访旧邻，难忘旧邻之情。
善鸣的鸟，易被攻击；逞能的人，总要跌倒。
饮茶观鱼时，有朋来正是双喜；养花种草后，无人时也可悠然。
人生是长跑，不要急慢慢跑；每天是短跑，不要抢跟着跑。
心有新鲜感，事事熟悉快；人有



老有所乐

我的“自由”行

文 / 郑自华

一直有去美国的夙愿，却无法成行，无法成行的原因和时间、金钱无关，而是和“自由”有关。我是个肢残人，又是个六七十岁的老者，行动不便。飞行十几个小时，路程达 1 万多公里，然后所有的行程都是在巴士上，掐着时间赶景点。如此高密度的行程，一般人都觉得累，遑论我这样的人。再说，我这个人怕给人带来麻烦，不希望因为我的原因而拖了别人的后腿。

带着矛盾的心理，我踏上了美国西部游之旅。经过 10 个多小时的飞行跋涉，飞机稳稳地停在了停机坪，此刻我的心却无法平稳。从飞机上下来，有长长的通道，然后还有安检、海关申报，以及取行李，如何应对？正在纠集中，看见机舱门口停着两辆轮椅。一个女士已经坐了上去，有人说是有预约的。我没有预约，上前问：“May I use it?（我可以使用吗）”推轮椅的是个拉丁美洲裔模样的老人（顺便说一下，在美国，很多岗位都是由老人担任），一口“ok”，我的心稍稍得到了平静。我问：“Where are you from（您来自哪里）？”不知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还是因为我的英语太烂，我听不懂他说了什么，那就姑且称其为“拉丁美洲”吧。“拉丁美洲”向我索取了“登机牌”，在本子上做了记录，很熟练地推着我经过了漫长的通道，直奔安检，找了特别通道，也不用排队，很快办好入境手续，然后往海关，交了申报材料。我想如果让我自己办完这些手续的话，估计是一身汗了。出了海关，“拉丁美洲”继续推着我到取行李的“大转盘”处。哦，原来我的登机卡上的信息早就告诉了他一切。我问：“box（箱子）？”“yes！”“one or two（1 件还是 2 件）？”我回答：“one。”等了 10 分钟，终于看见我的行李箱了：“look! look!（看！看！）”“拉丁美洲”按照我手指的方向，“this（是这）？”我连连点头：“ok,ok！”“拉丁美洲”又问：“only one（确认一个）？”“yes!”我知道美国是个小费国家，我悄悄地在 he 手上塞进小费：“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拉丁美洲”一直将我推到了出口处。平时我是一直处于末尾的，这次却争了个第一。到了出口处，地接导游小董推着轮椅在等候了。于是，我坐在轮椅上，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和明星有了亲密接触；坐在轮椅上，夜游拉斯维加斯，欣赏百乐宫屋顶 2000 片琉璃瓦所带来的震撼；坐在轮椅上，享受海滨城市圣塔莫妮卡的阳光蓝天白云沙滩。在去科罗那大峡谷，等候巴士，我欲下轮椅自己上车，小董说：“不用。”只见开车的老头按了一下开关，踏板自行打开，出现了坡度，导游推着我稳稳地上了车，然后只见踏板收了起来。就这样，在美国的 6 天中，我很“自由”地潇洒走了一回！